

日本文化史研究

〔日〕内藤湖南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K 313.03

N 402

日本文化史研究

〔日〕内藤湖南 著

储元熹 卞铁坚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0374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化史研究 / (日)内藤湖南著; 储元熹, 卞铁坚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ISBN 7-100-01911-7

I. 日… II. ①内… ②储… ③卞… III. 文化史-研究-日本 IV.
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469 号

Rìběn Wénhuàshǐ Yánjiū

日本文化史研究

〔日〕内藤湖南 著

储元熹 卞铁坚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1911-7/K·449

1997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14 千
印数 2000 册 印张 9 1/8

定价: 13.40 元

内藤湖南著

日本文化史研究

東京弘文堂 1930 年

据日本弘文堂 1930 年版译出

2092/22

出版说明

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通过邀请西方史学家到东京大学讲学,和派遣青年赴欧美留学,把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学科介绍到日本。此后日本史学界开始使用近代的史学方法来研究历史、西洋史和东洋史。由于受到政府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和重视,史学研究在日本有了较快的发展,不少学者在大学讲授东洋史,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培养了许多人才。到了20世纪,东洋史学界在日本形成了以白鸟库吉为首的“东京学派”,和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二者东西对峙,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本书作者内藤湖南(1866—1934)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东洋史“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他生于秋田县。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他从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师,1887年去东京,从事杂志编辑工作,同时在一家美国人办的学校学习英语。1890年他参加编辑《日本人》杂志,深受该刊的负责人、主张日本主义的评论家三宅雪岭的影响。1894年他加入《朝日新闻》社,曾任该社主编高桥健三的秘书,后任《台湾日报》主笔;1899年他来中国旅行,与我国学者严复、罗振玉、王国维等有过交往。这时期他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的社论,提高了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知名度。此后,他又受日本外务省和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委托,到中国做调查研究,搜集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资料。1907年他在京都大学任教,后成为东洋史教授。此后的20多年中,他长期从事中国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由于他多年来活跃于东洋史学界,并从学术方面为政府向

中国的扩张活动进行协助，确立了他在日本史学界的地位。同时在京都大学形成了东洋史的“京都学派”。他在中国古代史、金石、甲骨文、清史、中国史的历史分期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研究成果。1924年赴欧洲旅行，参与过敦煌文献的调查活动。1926年退休，并成为学士院会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世史》、《中国论》、《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近世文学史论》和《日本文化史研究》等。

本书是作者的日本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原书汇编了作者有关日本文化史的讲演和报刊文章等，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内藤湖南对日本文化和历史的部分独到的见解。由于作者对中国史的造诣颇深，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内藤以通俗的文字，对日本文化和历史问题发表了一些相对说来比较深刻的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内藤湖南在日本史学界被称为东洋史方面的泰斗，日本历史、文化研究虽然不是他的专业，但他的研究成果也达到较高水平，可供借鉴。不过，作者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是站在维护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的立场上，因此，他的言论经常表现出国家主义的倾向，这是应当提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的。

1995年5月

目 录

序文	1
序	2
何谓日本文化(一)	3
何谓日本文化(二)	10
日本上古的状态	15
近畿地方的神社	21
圣德太子	40
飞鸟朝的中国文化输入	50
关于旧抄本《日本书纪》	56
唐代文化和天平文化	61
弘法大师的文艺	88
平安朝时代的汉文学	111
日本的肖像画和镰仓时代	121
日本文化的独立	133
关于香料的原产地	152
谈谈应仁之乱	166
日本国民的文化素质	182
日本文化的独立和普通教育	194
大阪的商人和学问	207
谈谈维新史的资料	217
日本风景观	222
儒学	235

序 文

《日本文化史研究》问世已经七年。把其后刊载于报章杂志上的或演讲中发表的有关日本文化方面的文稿汇集起来加以增补，便成了此次的新版。本应把各个时代增补的部分按适当顺序插入其中，但从印刷的角度考虑，不得不把增补的各篇汇集一处，敬乞读者原谅。因此，请读者在阅读时，把《飞鸟朝的中国文化输入》、《关于旧抄本日本书纪》、《唐代文化和天平文化》这三篇插到旧版《圣德太子》之后；把《关于香料的原产地》插到《日本文化的独立》之后；把《日本国民的文化素质》、《日本文化的独立和普通教育》这两篇插到《谈谈应仁之乱》之后；把《日本风景观》放到《谈谈维新史的资料》之后。纵令如此，在评论日本文化的各个时代上尚有许多不足之处，而且还有正在继续记述之处，我准备在下次改版时再予以解决。总之，一如旧版时，我的日本文化观仍然是外行人的史论。这一点请各位谅解。

著者谨识

1930年10月25日

序

最近几年来,我应史学地理学同学会及其他方面之邀,在各地做了几次关于国史的演讲,这些演讲笔记刊载于报章杂志上,现在搜集起来,稍加订正,印成了这本小册子。一排目录,则大抵涉及各个时代。至于未涉及的时代,我也稍有管见,想予补白,但西行之前时日无多,只把已写成的部分收了进来。按时代顺序看,难免残缺不全、面貌丑陋之嫌,但也别无他法。待再版时再予补救吧。我在国史方面是门外汉,肯定会有许多谬误和缺点。读者如能把它作为门外汉的历史观看待,也许可以感到一种兴味。

内藤虎次郎

1924年7月4日 西行之前两天

何谓日本文化(一)

文化这个名称近来很流行,无论什么东西一加上这两个字,似乎就身价十倍。可是平常一般人对文化这个东西究竟理解到什么程度呢?文化是以国民全体的知识、道德、兴趣等为基础而建立的,那么作为文化基础的知识、道德以及兴趣,在现代日本到底达到哪种程度呢?由人生需要而产生的政治、经济等事象,必须符合于民众,凡是不符合民众方法的,都将作为时代错误而遭排斥。作为文化基础的知识、道德以及兴趣,也必须是民众的么?如果不是民众的,就一定是时代错误么?当我们考察现代日本的知识、道德以及兴趣的实际情况时,就觉得非常不安心。特别在我们所专攻的史学方面,尤其是这样。

最近有人宣传在富士山某个地方发现了神代的记录,那上面记载了神武以前几十代的史迹,而且还有人相信它。什么是伪装的历史,什么是真历史,很多人似乎还分辨不出。东京还有一位“居士”,在上流社会很有势力;还有人收集官吏、军人以及别人的信仰,对《古事记》作出不科学的解释。如果这些就是现代日本民众对于历史、道德方面的知识,那就不得不怀疑从明治初年到今天的五十年中间,作为日本文化基础的民众的知识,到底是进步了呢还是没有进步。

明治初年,大分县一个名叫某某的骗子发现了一部用神代文字写的《上記》,他用现代语把它译了出来,欺骗了当时的名记者岸田吟香把它印成了书。这本书把神代延长了几十代,还捏造出每

一代的编年史。据三浦博士^①说，最近在富士山发现的神代记录，和《上记》几乎完全相同。对于本国历史，今天几乎和五十年前同样盲目。既然有这样凿凿可据的事实，那么我们说我们怀疑日本的进步，也不能算作偏激之论吧。今天我对日本文化的持论，说不定不会被多数人理解，甚至有时还将遭到很大的反感。所幸最近一般思想倾向对于学者的自由研究比过去宽松了。因此，尽管自己不相信日本多数人的历史知识，还是想把鄙见作为自由研究的一得陈述出来。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爱抬高本国，这突出表现在抬高本国文化这一点上，认为本国文化是自发的。然而，除了极少数历史悠久的古国像埃及、中国、印度之外，自发文化这种想法可以说是毫无理由的谬想。打个比喻来说，小孩子一生下来，到了懂事的年龄，长辈的教导就成为他们知识的基础，这是谁都明白的事实。等到孩子成人以后，如果他自负他的知识本源，认为他生来就具备识别其他知识的见识，能同化先进长辈的知识，从而发展成今天的水平，那么任何人都将嘲笑他这种主张是无耻的谰言。个人之间这类自明之理，一到国民中间就莫名其妙地会作出不合情理的解释。对于日本文化的起源，也存在着同样的错误想法。以国史家为首，许多日本国民到今天还都肯定日本文化最初就存在，倾向于把它解释为选择、同化了外国文化而达到今天的发展的。这一错误思想由来已久，不妨说日本人一有国民自觉，同时就已被这种错误思想幽囚了。所谓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起源论，最后几乎都是建立在这一立论方法上的。日本采纳了中国文化从而获得进步发展，这个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不过德川幕府中叶的一批国学者，

^① 指三浦周行(1871—1931)，明治、大正时代的历史学家、文学博士。京都大学教授。

甚至连这一看法也都反对，认为一切从外国采用的东西，日本原来就有，而且都没有日本原来的好。正由于采用了那些外国东西，弄得日本文化不纯粹了，从而毒害了日本的国民性。这种议论，谁都认为是强词夺理不服输，现在已经失去了市场。不过坚持日本文化为基础，对于外国文化原来就有选择的识见，这种想法到今天依然颇流行。

举个例子来说，忠孝这一名称自然是从中国输入的。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日本国民原来充分具备忠孝之事实，只不过借用中国输入的名称，称呼自己所有的东西而已。可是如果从根本上想的话，既然国民具备德行的事实，又有原来的国语，那就必然会有相当于这一事实的名称。比如今天日本人计数，用的是中国输入的文字一、二、三、四，也用它的发音，可是在输入语之外，还有原来的国语一ツ二ツ三ツ四ツ。不过，有时也像朝鲜那样，在表达东西南北等概念时，完全没有本国语言，只能用变形的输入语。尽管这样，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时，当初有一个时期曾用前后代替南北，直到近代，朝鲜方言中还可以发现这种遗迹。但是，像忠孝这类话，在汉语传入以前日本民族究竟怎样表达，始终没有发现。作为人名的孝字，训读为“よし”“たか”，它的意义是“善”和“高”，不是对父母的特别用语。“忠”字训读为“ただ”时，它的意义是“正”，训读为“まめやか”时，是“亲切”的意思，都不是对国君的特别用语。日本古代如果只有对一般善行正义的语言，没有对家族关系和君臣关系的专用语言忠和孝，那么当时有没有那样的思想，不是大成问题吗？这不过是眼前显而易见的例子。但是我们不是可以怀疑一切文化现象全都是这样一种关系吗？如果我们从近年发展很快的史学考古学等知识来考察，疑问就更多。一般都把神武纪元作为日本历史的起源，神武纪元以后的数百年间，还是传说的时代，不是记录的时代。可是，尽管神武以后神代的事情大多属于神话，但

从中不难找出一些历史事实。比如说某个地方在某一时期形成了民族团体，那个地方就产生了当地的传说。至于年代方面，近来大多数历史家推断为耶稣纪元前后。这一推断决不是凭空捏造。从考古学的进步而渐次出土的遗物来看，有些还是耶稣纪元前的东西。而且当时出土的那些遗物，其中有许多已被认为显然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变形。

近来铜铎和古镜的研究进展很快。铜铎大体上是由中国的钟变化过来的，一般认为不是归化中国人所创，而是土著民族仿造的。充当铜铎范本的中国器物，至少是先秦时代中国民族的用品，土著民族仿造的时代已经是耶稣纪元以前，这是可以举出许多证据加以证实的。此外更明显的遗物是古镜。被认为是汉代亦即耶稣纪元前的已出土的古镜，九州北部和近畿部分地区多有所发现。近畿地方还发现许多由日本民族在东汉时代已经仿制的变形汉镜。这一文化传播的途径也逐渐明了起来。居住在朝鲜南部的一些日本民族逐渐把中国民族所用的器物日本化，这些古镜后来在日本内地又大大有所变化，这一事实也逐渐明了起来。看到那些在西汉时代已经变形的铜铎是由日本民族制造的证据时，就可以肯定从中国接受那些尚未变形的铜铎原物的时代必然还在西汉以前。既然这样，那么中国文化至少在战国末年就已经传播给日本民族了。相当于那一时代的事实，在日本历史及传说中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可以断言当中国文化最初传到日本的时候，日本民族还没有形成类似国家这样的社会组织。这一事实不仅日本一个民族是这样，凡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周围各民族，几乎可以说同出一辙，都可以拿来作为有力的旁证。例如，高句丽和三韩也都是如此。高句丽立国以前，国土已经受到中国的行政统治。高句丽在辽东地方（今天满洲的兴京地方）开始建国的时候，汉朝已经在那里成立了玄菟郡高句丽县，西汉末年中国统治权衰落时，那里的

当地民族才在中国行政区内建立起半独立的地方组织，以后逐渐发展成为高句丽国，那已经是王莽时代了。尽管如此，高句丽国仍然是朝鲜民族中立国最早的，当时三韩地方都还没有建立起国家。三韩的最初立国，大概在东汉的中叶以后，那时汉朝在朝鲜全境建立了郡县，包括在其统治范围之内。可是东汉的中叶以后治权衰落，三韩的七十余国那时方形成许多小部落。固然，在此以前，即汉在朝鲜建立郡县之前，中国的政治亡命者已经在那里建立过朝鲜国，比这更早的时候，还有所谓箕子的朝鲜。不过，箕子这一传说，西汉时代的中国历史还记述得很不确实，直到三国时期才出现箕子国祚悠久的记录。即使这是事实，也不过是战国时代受到燕国文化的刺激而兴起的一种传说，决不是以前朝鲜民族所保存的他们祖先的传说。这也像中国内地之有吴、燕等传说一样，是同一种类的东西，都是战国时代中国文化传播以后的现象。

日本民族的立国大体上和高句丽同一时代，比三韩的立国为早，不过其立国的途径则几乎相同。当然，日本不同于高句丽和三韩，它不像高句丽和三韩那样曾一度成为中国的属地，然后再产生民族自觉。只是因为中国人迁居日本内地，或者说在民族形成以前，具有特种技能的日本民族通过海上交通在朝中沿岸和中国民族接触，学习了他们民族形成的方法，或多或少自发地创立了国家。因此可以认为在民族形成的摇篮时代，日本民族的素质就比朝鲜人优秀。打个比喻来说，过去日本学者对日本文化的起源解释成为树木的种子本来就有，后来只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养分而成长起来的。我却认为比如做豆腐，豆浆中确实具有豆腐的素质，可是如果不加进使它凝聚的外力，就不能成为豆腐。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如果再举一例说明的话，就像孩子天然具有获得知识的能力，然而要使孩子有真知识，就必须靠先进长辈的教导。

所以依靠中国文化而形成日本文化，年代非常悠久，政治上、社会上的进步是点点滴滴地完成的。一般地说，一个民族即使继承某一异民族的文化，到了一定时代也会导致一种自觉。不仅日本是这样，中国周围其他后进民族也是这样，例如汉代的匈奴，受到中国文化的刺激而形成了民族，因而产生了民族独立的自觉。西汉初年，匈奴对汉皇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见《史记·匈奴列传》）。日本圣德太子时，对中国也开始用“日出处天子”的对等称呼。以上两例都说明民族自觉最初常出于政治原因。不过有时也有不发生这种自觉的国家，比如朝鲜就是这样。日本民族在某一时代毕竟产生了思想的自觉，据我个人的看法，蒙古的入侵大概就成了日本民族自觉的最大动机。从南北朝起，以后就一点点产生了文化上思想上的自觉。最近又接受了中国以外的文化和思想，对中国文化在思想上可以说是完全独立了。不过真正的日本文化今天是不是完全形成了呢，还是很值得怀疑的。思想上虽说已经完全脱离了在中国思想的束缚，可是现在却同时在受西洋思想的束缚。文化的极致在艺术上表现得最显著。拿日本绘画来说，一百年前就已经竭力摆脱古代中国画的束缚，可是尽管摆脱了中国艺术的束缚，日本画却并不是能和中国艺术相抗衡的高层次的作品，只不过是在中国艺术上添加些日本地方色彩而已，很难说是真正自觉而且独立的作品。例如日本写生派的艺术就是那种货色。而且最近这一派的艺术已出现动辄受西洋画束缚的倾向，要说日本艺术的真正独立，觉得还是遥遥无期的。不过即使没有摆脱别国文化的束缚，也并非绝对不可能提高本民族的生活，或者影响及于其他低等民族，甚至影响及于比本民族更先进的民族。尽管有时也会把这种艺术当作是本民族的文化，但是严格说来，那究竟不能算是民族自发的文化。

这样历史地考虑一下日本文化的由来，就觉得非常不安心。

不过想到那毕竟是由于民族还年轻,将来真的进入了民族的成熟期,可以说还是鹏程万里的。不过,像前面所说,民族不一定从幼年顺利地发展到老年,有些民族就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我们的责任就在于使日本民族不遭逢这种不幸的命运,而是要使之顺利发展,使之成为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的一大力量。

(1922年1月5—7日《大阪朝日新闻》)

储元熹 译

何谓日本文化(二)

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我想在二十分钟之内把自己想说的东西的轮廓扼要说完。

我要说的题目是“何谓日本文化”。首先我们肯定现在有日本文化。可是日本文化的现状是如何呢？现有的文化包括社会组织、文学艺术，还有其他各种东西。我们所要问的是现有的日本文化中，日本固有的东西有多少。这一问题视研究方法而颇费周折，答案也众说纷纭。我却马上说出结论，认为查一查日本文化中起源于本国的东西，并不那么多。

举个极简单的例子说，日本文化最早的产物比如《万叶集》这部诗歌集，还有用日本古文写的《源氏物语》。当我们读这两部书和现在用汉文写的《论语》时，究竟哪部书容易理解呢？单凭这件事，谁都会毫不费事地想到对于我们今天的日本人来说，我们的头脑最容易理解的说不定是习见于东洋的中国文化，而不是日本固有的文化。这还只是现状的一个梗概。我们既然认为日本文化是俨然存在的事实，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日本文化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一种文化的形成，可以比作动植物的种子得到养分后渐渐发芽，然后成长起来；也可以比作像做豆腐，在豆腐未做成之前，先有豆浆，等到放进盐卤，豆浆就凝结成为豆腐。这两种形成方式中，日本文化属于哪一种方式，我认为是个问题，这个问题而且非常棘手，我以为说不定属于后一种方式。日本国内并没有什么现成的